

## 序 言

夫研幾探微莫深乎易，顧易學廣矣！古今鴻儒萃力於斯者，不知凡幾。或演其象數，或作其圖書，或求其義理，故典冊充棟，望之興嘆！

余前曾治船山易學以爲博士論文，近年因教學之便，幸得續研易學，兼及朱子，深感朱子好學敏思，誠爲中國哲學史上難得之學問家。錢穆先生曾於其「朱子學提綱」中贊曰：「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爲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註）其言雖不無溢美之辭，然朱子在中國學術史上之重要性，亦不難想見。

易學非惟群經之首，更爲宋代新儒家發展天人性命學之一大泉源。故北宋諸儒，自周敦頤、程伊川，更以來，皆所重視。周濂溪、張橫渠、邵康節與程明道，亦深得於易。爲朱子理學思想承宗之程伊川，更集畢生之力，成易傳一書。朱子鑽研以上諸家易學，並有評述。至其所著易本義，因主張易學爲卜筮之書，引發後人不少爭論。實則朱子非但以易說易，以經學注易，且以理學解易。

朱子易學含多方學術興趣，除兼具象數、圖書與義理外，其易學與理學思想，更是相互融通發明，從而發展其形上學、宇宙論與人性論。其中，朱子尤重宇宙論，故其人性論與道德修養實踐論，皆在宇

由論的基本下發展。

本文雖對朱子易學多方涉及，然以哲學觀點為歸宿。所據資料，除朱子易本義及易學啓蒙外，凡朱子語類與朱子文集中論及相關之語，皆在蒐羅範圍之內。

朱子學問興趣極大，涉獵又廣，並分別探討諸般問題，匯歸於其所綜合之大系統中。因此，朱子錯綜複雜之易學思想，董理匪易。余也不敏，雖願言述，或恐不免掛漏之譏。然復有云者，蓋因朱子易學鮮人專文論述，遂思如能宏揚其精言奧義，或澄清若干駁雜處，使人正視，從而裨益吾民族道德之重振與文化之復興，則豈惟余個人之幸，抑亦國家之幸歟？

註：見錢穆先生著「朱子學提綱」（作者自印，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初版）頁一。

# 目錄

## 序言

第一章 朱子及其思想背景	一
第一節 朱子生平	一
第二節 朱子學術時代背景	七
第三節 朱子易學淵源簡述	一〇
第二章 朱子論易及其易學著作	二一
第一節 朱子對邵康節及程伊川治易之評議	二二
第二節 朱子的易學著作	二七
第三節 朱子對易書的成書看法及評價	三二
第三章 朱子對易書中卦、爻、辭之看法	四三
第一節 卦	四三

第四章 朱子釋易書所涉及「數」之問題	七一
第一節 參伍錯綜問題	七二
第二節 天地之數問題	七三
第三節 大衍之數	七七
第四節 以數行蓍策求卦之術	七九
第五節 由老陰、少陽、少陰、老陽之數得「當期之日」、「萬物之數」與「八卦而小成」：八四	

第五章 朱子對易書中象、位、時之看法	九一
第一節 象	九一
第二節 位	九六
第三節 時	一〇四

第六章 易書言物表情達意之方法論	一一一
第一節 易書的語言符號與實在世界之關係	一一一

第一節 易書的語言符號與實在世界之關係	一一一
---------------------	-----

第二節	卦爻符號的表達方式	一一八
第三節	易書中「辭」的表達方式	一二一

## 第七章 朱子注經的體例

第一節	對主爻與卦義的認取法	一二七
第二節	以爻德爻位爲原則的注經法	一三〇
第三節	爻與爻間的關係	一三三
第四節	本漢象數易以注易	一三八

## 第八章 朱子易學的形上學

第一節	釋名義與定題位	一四三
第二節	朱子之前的太極說	一四五
第三節	朱子的太極說	一四九

## 第九章 朱子易學的宇宙論

第一節	陰陽	一六五
第二節	乾坤文言傳的宇宙發生論——乾坤之道	一七四

第三節 宇宙生成變化的歷程論 ..... 一八一

第十章 朱子易學的人生哲學 ..... 一九七

第一節 人性論 ..... 一九七

第二節 本天德立人德 ..... 三〇三

第三節 進德與修業 ..... 二〇九

結語 ..... 二二三

附錄 · 主要參考書目 ..... 二二七

# 第一章 朱子及其思想背景

## 第一節 朱子生平

朱熹字元晦，亦字仲晦，別號有晦庵、晦翁、雲谷老人、遜翁、滄州病叟等等。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學者稱晦庵先生。其先世本爲富裕之家，及至其父朱松（字喬年，號韋齋，一〇九七—一四三），則家貧，曾爲就職建州（故治在今福建建甌縣）政和縣尉，而質其先業百畝，以舉家由徽至閩。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〇年）熹生，自幼穎悟。年十四，丁父憂，孤且窮，其父遺囑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以熹之學業屬胡憲（字仲原，號籍溪，一〇八六—一六二）、劉子翬（字彥冲，號屏山，一一〇一—一四七），與子羽之弟劉勉之（字致中，號白水，一〇九一—一四九），乃奉母往依父友劉子羽，從胡氏二劉受業，勉之並以女妻之。年十九，登紹興十八年（公元一一四八）進士第，尋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子員，日與講說聖人修己治人之道，建經史閣，定釋奠禮，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秩滿，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時李侗（字處中，號延平，一〇九三—一一六三），嘗學於羅從彥（字仲素，號豫章，一〇七二—一三五），爲程頤（字正叔，號伊川，一〇三三—一一〇七）之三傳弟子，學者稱延平先生，熹往師事之。

三十三歲那年，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應詔上封事。隆興元年（公元一一六三年），復召對。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熹主戰以復讎，不合，因除武學博士，待次。其後雖屢蒙召薦，均辭謝。淳熙元年

(公元一一七四)，始拜命。五年，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又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使學子切實遵行。明年夏，大旱，應詔上書直諫，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會浙東大饑，旋改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入對，言帝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孝宗爲之動容。未幾，熹以前後奏請或見抑，或等閒視之，致己之理想，終難實現，乃辭去官職，退而從事經術與講學，雖屢有任命，多辭不就，然對國事猶常在念中。紹熙五年（公元一一千九四），寧宗即位，趙汝愚爲相，熹被舉爲侍講，時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上疏斥言竊柄之失，遂觸韓氏之忌，任侍講僅四十六日即被罷免，反對熹者亦乘機大加誣謗中傷，甚有指熹窺伺神器，上書乞斬之以止亂，是時從遊之士，或隱匿避禍，或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仍日與諸生講學不休，一以闡揚大道爲己任。慶元六年（公元一二〇〇）卒於福建建陽考亭家中，年七十一，疾且革，猶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後侂胄死，賜謚曰文，世人因尊稱熹爲朱文公。理宗寶慶三年（一二二七），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淳祐元年（一二四一），詔從祀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

熹學得小程子（程伊川）之傳，黃榦（字直卿，號勉齋，一一五二—一二三一）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所以成始成終也。」（註一）朱子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重要著作，多成於四、五十歲之間，此時又因和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一一三七—一八一）、陸九淵（字子靜，稱象山，一一三九—一九三）兄弟交遊，得相與討論，惟鵝湖寺（今江西鉛山縣鄱陽湖濱）一會，終以與九淵等哲學上立論之殊異，不歡而罷。至其於學術上之貢獻，在爲宋學建立一個新傳統，即把周敦頤（字茂叔，

號濂溪，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張載（字子厚，號橫渠，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和二程（程顥、程頤）並尊，以周張宇宙論形上學，與二程之心性修養工夫融和，又加上熹自己增入的讀書法，三流交滙，宋學遂臻於完整（註二）。其弟子黃榦曾讚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註三），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等；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皆行於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註四）

就朱子思想大體的淵源和發展而言，其父朱松曾師事羅從彥（字仲素，稱豫章，一〇七二—一三五），與李延平嘗爲同門師友（註五），對大學與中庸用功甚力。朱子自述早先曾從其父讀二程所傳的論語（註六）。朱子遵其父遺囑所師事的胡憲、劉子翬及劉勉之其學脈所承，示於宋元學案卷四十三，全祖望說：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於禪。

白水年青時正逢伊洛之學禁，籍溪和白水同鄉，二人皆諳學程氏書，其中以白水尤甚。白水、籍溪及屏山大抵爲伊洛之再傳或三傳，亦皆好佛老，朱子父親亦然。他們的爲學興趣較廣，不侷限於某家某派，學問造詣因而顯得缺乏深度，朱子受父命所從事的三師，待朱子甚善，白水且將其女兒嫁給朱子爲

妻，數年後，白水和屏山過逝，朱子跟籍溪較久，然後又轉向學於李延平，朱子說：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註七）

延平從學於羅從彥之門，其從學的原因，可見於延平寫給羅從彥的信中：

先生服應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註八）

延平之學注重養心，不在於言說，而在於體驗與躬行。據王懋竑（一六六九——一七四一）所纂訂之朱子年譜（註九），得見朱子分別於二十四歲、二十九歲、三十一歲及三十三歲往見延平，共四次。至於延平所授予朱子者，牟宗三先生據朱子所撰「延平行狀」（註十），將朱子所記延平「開端示人」之大要，歸結爲四要點（註十一）：

- 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 二、「洒然」自得，「冰解凍釋」。
- 三、「即身以求」，不事「講解」。

#### 四、「理一分殊」，始終條理。

延平之學雖由心學入，但是朱子對「默坐澄心」，「洒然」自得地體認天理的路徑並不契合符印，却於四十一歲時（註十二）走上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註十三）的旨趣。牟宗三先生的解釋是：「延平雖供給朱子一入路，一題目，而文章却是朱子自己作」。（註十四）陳榮捷先生則認為：「朱子自幼年起，即始終不離程頤學說之薰陶。」「即朱子在延平答問中，提及程頤者十九次，提及程顥者九次。假若吾人將程頤之引語增計在內，則次數尤多。再予比較，則張載僅兩次，楊時五次，羅從彥三次。」「若謂朱子在與延平從遊之日，而內心已集向於程頤，當非誇言。」（註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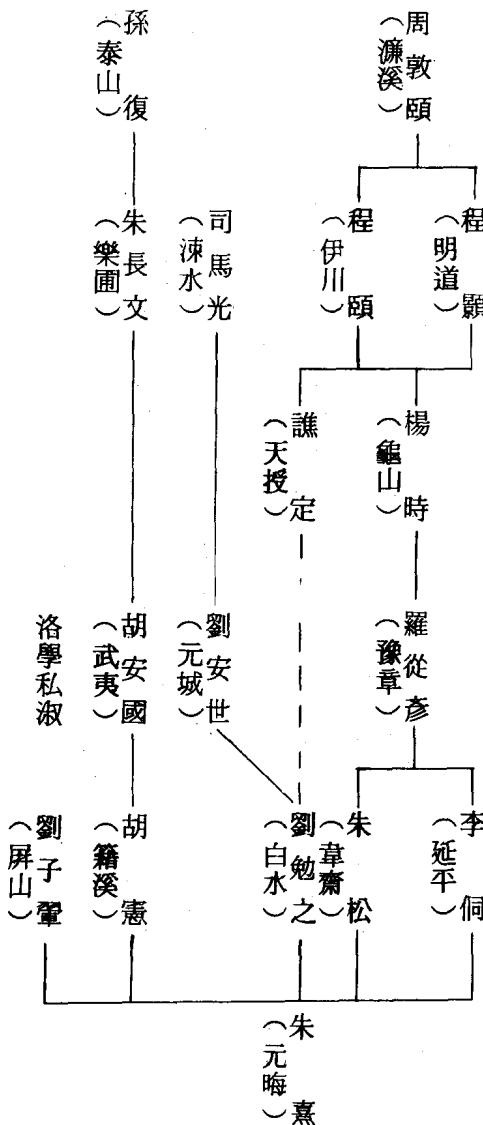
延平雖持即心直接體證天理的本體論路徑，而朱子則主張透過心格物窮理的漸教進路。然而延平研究對朱子有著啓蒙上的正面影響。錢穆先生論朱子之所得於延平者，有三大綱領，他說：

一曰須於日用人生上融會。一曰須看古聖經義。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難不在理一處，乃在分殊處。（註十六）

朱子在其所撰「延平行狀」中亦自謂：「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曰新如此。」可見延平對朱子是有正面的影響，所以朱子對業師抱持如此的尊敬與感謝之意。朱子雖然在治學心態上較相應於伊川客觀的嚴謹的分析窮理法，與延平主觀的默坐澄心的體證法較不契合，然而在延平寬厚的學術胸襟下，產生了彼此互相激盪、琢磨的效果。換言之，朱子借延平所予的激盪和磨鍊而發展了自己的學問性格，使自己的思路在日後漸趨成熟，遙契伊川的學向規模予以不斷的發展和綜合，成就了朱子在宋學中的獨特系統，奠定了其學術地位。劉述先先生說：

朱子一生強探力索，決不肯止於儼伺的了解，故其思想屢經轉折，歷經辛苦，最後才完成他自己思想的獨特型態。正因他肯去作衆端參觀的努力，絕不拘泥於一家言說，所以其思想的規模宏大，這是他的長處。然又因他經歷得多，慢慢培植一種自信，也不免顯露一些短處。他的思想自成一系，毫無問題。(註十七)

劉先生的評語可算是持平的公允之論。



## 第二節 朱子學術時代背景

我國經學，從其歷史發展言，大體可分漢學、宋學與清學。漢學長於訓詁，由漢至唐屬之；宋學長於義理，由宋至明屬之；清學則長於考證，有清一代屬之。然若單就學問內容言，惟分漢學與宋學耳。蓋凡以漢、唐訓詁之學為主者，皆漢學；凡以宋、明義理之學為主者，皆宋學；而清儒或墨守宋學，或復興漢學，或兼採並收漢、宋之學，另外在研究方法上，獨樹考證旗幟而已。至於所謂訓詁之學，係將經典字義，加以正確解釋；將經典看成歷史資料，加以客觀處理。所謂義理之學，係把握聖賢精神，使之復活；將經典視為哲學材料，加以主觀檢討。今就宋學之源起背景及特色，敍述如下：

### (一) 虛榮浮華學風之轉向

唐科舉取士，所考科目有六，計秀才、明法、明字、明算、明經、進士，其中明經科以五經正義為準據，罕能發揮，未如進士之作詩賦，可自由創造；加上時人酷嗜文學，歌女教坊亦以歌詩為能事，於是群趨進士一科，而詩賦盛，以致有唐一代乏著名之經師，篇實之學術研究，幾為虛華之文學所掩，下至晚唐五代，綺靡浮華之風更甚，士人萎靡，道德淪落，有識之士莫不痛之，於是改正士習、振奮人心之議，乃應運而生。

### 道佛之盛極而衰

漢初之黃老、兩晉之老莊，均盛極一時。至唐玄宗，以老子與王室同姓，而稱老子為玄元皇帝，詔諸州立廟，使州學生習道德經，同時亦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列子為冲虛真人。

另方面，佛學自東漢明帝傳來中國，開寺譯經，組社以講法，歷經魏晉南北朝以至唐代，均為佛學昌明期，而發展成十三宗，宗派之分，門戶之見，分列陳營。武則天後，禪宗嶄興，直至晚唐五代，佛學幾全歸入禪宗。五代時永明禪師著《宗鏡錄》百卷，擬包羅和會佛學各宗派之歧見，佛學盛運至此，亦宣告衰竭，所謂精華已竭，底蘊盡曝。於是人心思變，待儒家義理之學一倡百和，遂舉世趨之。

宋代理學家抑制私慾，顯發天理之高貴心願，勸人節慾於禮（理），慎其抉擇；更勸勉高層領導人物，拿出誠敬之心救世救人，並於義利、生死、榮辱、取與難以兩全之際，顯現純真明潔之良知，去私去蔽，無違天理，而能有所取舍。是力主誠、敬，以產生仁民愛物之懷抱。

### (三) 把持民族思想，維護道統——衛道排外

中國自漢魏以後，已無國防可言。唐雖中興，亦多假外力（突厥兵）以定國。五代中，惟朱溫與郭威為漢人，餘皆以胡人入主中國，北方燕雲十六州亦因石敬塘，淪入契丹之手，凡此皆政治上之積弱不振。再就文化言，漢魏後，佛教大有取代中國固有文化之趨勢，其間雖有道教之徒，曾以政治力量排斥之，致佛教有「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宗、唐武宗及後周世宗）之法禍，然終不能消滅之。初唐以後，又有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先後入侵，各得一時之盛；是文化上又不免受制於人。故自韓愈反對佛教，宣揚道統，後人無不感奮激烈。

有宋學者極思調和人生解脫與社會事功，使有佛道之優而無缺失，亦即能滿足人們內心之精神要求，而無佛道虛無寂寞、厭離人世之弊。如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既有超脫形骸之心境，又有「仁為己任」之懷抱，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註十八），皆生機活潑、無憂無慮人生態度之

具體表現。以這種超脫形骸之心境，深入社會，而實現救世救人之宏願，不啻合理之人生觀。如此，以理論的超勝方式，吸收佛道精華，並改進其缺點，自可使人心服，減少外在排斥之衝突。故宋代理學，可謂由儒入釋，復由釋入儒。至其所受佛道之影響，則有二焉：

1. 對固有「本體論上概念」，更加強盛與明顯，且使其變成重要。

2. 在思想格式上，常不自覺使用印度思想上之範疇。

綜言之，佛學入中國後，中國思想由非形上學一變為形上學，由少許形上學一變為十足形上學。先儒「天」字，不見得能與本體概念相當，而理學家即把儒家思想中本來缺乏的本體概念，加重分量，並使之顯明，居於中心地位，此亦文化上之要求。又孔子賦予士之使命，是維持正義，保障道德，處處講理，既要提高理性，勢必窮追吾人安身立命所以然之緣故。於是一切形上學所應有之間題，皆自然陸續出現。其中較能提供這方面資料及有啟發性之思想泉源，即為儒門經典——易傳、中庸和孟子，就宋儒發展形上思想和宇宙論言，其重要性自可不言而喻矣。

#### (四) 儒學研究方向之轉變

漢儒承秦火之後，不能不為補苴之功，其崇尚訓詁考證，亦所謂時為之也，先秦儒家成德之教，亦轉為經學。至唐代更致力於文字訓詁、名物考據、章句分析，偏枯於經籍之研究，去尊德性、經世致用之風日遠，是將用以研究先哲經傳之手段——名物訓詁，視為目的，而不知探討其中義理，方為真正目的。於是相沿千年之學風，不得不物窮則變，遂由客觀外在之經典研究，轉而致力於主體內在之身心修養，此乃理學所以勃起之主因。

自唐五經之欽定義疏（註十九），漸失權威，不再爲人所接受，宋學者遂傾向于自由之註釋，如孫復（字明復，稱泰山，九九二—一〇五七）與石介（字守道，稱徂徠，一〇〇五—一〇四五）研討春秋，司馬光（字君實，一〇一九—一〇八六）、王安石（字介甫，封荆國公，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張載（字子厚，稱橫渠，一〇二〇—一〇七七）與程頤，各爲易經作注，皆以「自得」爲主，「新義」運動亦隨之興起，首發軔于孫復之「春秋尊王發微」，至王安石爲詩、書、禮三經作註疏，而達于高峯。王安石影響之大，其註疏被稱爲「新學」。程頤易傳則尤進一步，乃直是用易傳來合他道理，有時且與本經無涉，甚或有悖於本經，五經遂成載道之文。與此一發展平行並進者，則爲對五經之懷疑，此懷疑之風，首出於歐陽修（字永叔，一〇〇七—一〇七二），至朱熹更將五經權威完全移除，此可由其隨意更訂經文見之，蓋以朱子不僅需要格物之觀念，以成就其哲學體系，且不欲再拘束于五經傳統權威之下。嘗云：「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註二十），又云：「如識得理，經典何爲？」（註二十一）

### 第三節 朱子易學淵源簡述

據漢書儒林傳載，孔子授易商瞿，瞿授魯人橋庇，庇授江東駢臂，臂授燕人周醜，醜授東武孫虞，虞授齊人田何，凡六傳而周滅於秦。及秦視易爲卜筮之書，得免焚書之難，故易之今古文本無大差異。劉師培先生（字申叔，一八八四—一八一九）於其國學發微云：「近代學者知漢代有今古文家之分，吾謂西漢學派祇有二端，一曰齊學，一曰魯學。治齊學者多今文家言，治魯學者多古文家言。如易經一書

有田氏學，爲田何所傳，乃齊人之治易者也。……（大約京房爲齊學一派，喜言災異，而東漢所傳則大抵爲魯學一派，亦有卦氣、爻辰之說），是易學有齊魯之分。」（註二十二）

今文經之易學，其傳授皆出於田何。漢書儒林傳云：「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其中以丁寬，最能傳田何之學而光大之，漢書儒林傳又曰：「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事何。……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陽城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此外，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劉向（字子叔，前七九—前八）校書考易說，謂諸家易學皆出於田何，唯京房獨異。劉師培國學發微又云：「漢人治經多喜言災異，且多引讖緯，近於陰陽家言，京房傳易學于焦延壽。焦著有焦氏易林，而京亦作有易注，此陰陽家言之參入周易者也。」（註二十三）又東漢費直以經解經，亡易之章句，僅以彖、象、繫辭、文言等十篇解說上下篇。綜觀兩漢易學，西漢今文之施、孟、梁丘、京四家盛行，立於學官，古文費氏易行於民間，不得立。東漢今文四家雖仍流行，然費氏易漸興，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字季長，七九—一六六）亦傳之，馬融授鄭玄（字康成一二七—二〇〇），玄作注，荀爽又作易傳，從此費氏易藉馬融、鄭玄之力大行（見後漢書儒林傳）。而今文四家漸衰乃至失傳。漢人習易，仍以卜筮爲主，而費氏以彖象等十篇說經，使易學趨於哲學之研究，而由卜筮轉爲純儒家之學術，其所以較勝於他家者，不無原因也。熊十力先生云：「漢人滯於象，而不得孔子之意。雖間存古義，而無所發揮。蓋漢世易學家，大都承術數家之遺緒。即田何後學，號